

希望與傷害:我的 UFW 故事

走在兩個世界之間

我的家人住在加州馬里斯維爾(Marysville)的愛德華茲(Edward)街,那是薩克拉門托河谷的一個小鎮。我們的房子在死胡同的盡頭,物業旁邊有一片開闊的田野,一直延伸到保護馬里斯維爾免受尤巴河(Yuba)和費澤河(Feather)洪水侵害的堤壩。

當我們剛搬到愛德華茲街時,母親只允許我們在田野裡走一小段路。我們的邊界是一堆由施工隊留下的、長滿高草的土丘。放學後,我和兄弟姐妹會跑進田野,爬上小山頭,然後尖叫著、咯咯笑著滾落草坡。有時我會迅速爬起來再玩一次,有時則會靜靜地躺在山腳下,隱身在草叢中仰望天空。蚱蜢在身邊跳躍,發出喀噠聲。我用手指追蹤著比爾空軍基地飛機劃過天空留下的噴射雲跡。黃昏時分,媽媽會喊我們回家吃飯。我們家有十口人;八個孩子分坐長桌兩側,父母各坐一端。

青少年時期,我喜歡獨自穿過田野走向堤壩。家裡有七個兄弟姐妹,很難找到安靜的角落,但當我獨自行走時,世界就成了我的私人空間。站在堤壩上,我可以轉上一整圈,看見天空像一個倒扣的碗一樣觸碰大地。南邊是小鎮的屋頂、街道和尖塔,以及延伸出去的廣闊河谷。在北邊望去,馬兒在梅子林旁吃草,稻田以悅人的幾何圖案向喀斯喀特山脈(Cascades)蒼白的山峰伸展。在東邊,泛黃的丘陵逐漸過渡到內華達(Nevada)山脈被白雪覆蓋的花崗岩。在西邊,一座微型山脈以一種神秘而完整的姿態,從谷底拔地而起,那便是薩特山丘(Sutter Buttes)。越過這些山丘,便是海岸山脈那舒緩起伏的藍色山坡。

我最喜歡日落時分。西方天空燦爛的紅與金，會以淡雅的色調倒映在東方的丘陵上。隨著暮色漸濃，薩特岡會變成深紫色，小鎮的燈光一盞盞亮起。我喜歡走在世界之間：堤壩標誌著城市與鄉村的邊界，日落則是黑夜與白晝的交界。

不知不覺中，那些散步對我來說變成了禱告。我從未打算去堤壩祈禱，我只是知道自己喜歡待在那裡。但漸漸地，在行走中，我開始感受到創造的美好，以及那位一言而造萬物者的存在。讓我感到快樂的是在這個處於中間的地帶和處於中間的年紀，既不再是孩子，也尚未成女人的階段，獨自漫步在馬里斯維爾(Marysville)的田野和堤壩上。

事情在我十四歲左右開始發生變化。世俗开始闯入我的清静。我記得在 Denny's 餐廳，一個服務生邊跟我父親說話邊盯著我看。幾天後，當我在堤壩散步時，一名摩托車手停在我身邊。正是那個服務生。他臉色紅潤且虛胖，留著金色平頭。

“你真的不該一個人待在這裡”他說，“要我載你回家嗎？”

“不用了，我沒事”我回答，“我就到家了。”

“好吧，但你不該單獨待在這兒”他一邊騎走一邊警告。一週後，我再次走在堤壩上，一輛坐滿男人的車停了下來。他們身上散發著酒氣，收音機大聲播著鄉村音樂。

“嘿，”其中一個猥瑣地笑著說，“想去釣魚嗎？”

“不想，”我一邊回答，一邊移向堤壩的坡面。我可以感覺到腳下的鵝卵石在鬆動，那一瞬間我考慮過滑下坡以躲開他們。其中一個男人笑了，司機猛踩油門。輪胎發出尖叫聲，車子飛馳而去。

事實證明，我再也不能單獨走在堤壩上了。但我還沒準備好放棄。有時我會說服妹妹佛羅倫斯或其中一位朋友陪我，但與人同行通常意味著必須交談，而我渴望的是沉默。

入夏後，我依然會去堤岸，但時間從傍晚改成了黎明。趁著大家還在熟睡，我會悄悄溜出家門。早晨的空氣清涼且濃郁，聞得到水蜜桃成熟的味道和剛割下的乾草香。西邊天色尚暗，星星還掛在山巒上空。東邊的地平線漸漸染上了一層灰亮的光。趁著晨曦初現，我踏上田野裡的步道，爬上了堤岸。然後我會坐在涼爽的柏油路面上，望著西耶拉山脈，感受大地朝著陽光緩慢旋轉。天色漸明，星辰接連消失，最終天際只餘下一顆晨星。很快地，天際染上了幾抹粉紅和嫣紅的霞光。當一道璀璨的金邊從山巔破曉而出，草地鸚（Meadowlarks）也開始彼此唱和。

對不義的覺醒

多年後，當我作為一名中年女性在奧克蘭學校從事組織家長的工作時，國家公平計畫（National Equity Project）的同事 Victor Cary 問我，是什麼樣的生活經歷形塑了我對社會正義的關注。他認為，對正義的熱情通常源於對不公義的親身體驗。作為一名白人中產階級女性，我似乎不太可能成為一名社區組織者。於是我告訴他關於我雙胞胎姐姐的故事。她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女性，但在還沒有這種診斷的年代，她出生時就患有自閉症，此外還有學習障礙和癲癇。我對社會正義的熱愛，源於擁有一位身障的雙胞胎姐姐。我的健康是完美的，學業對我來說輕而易舉，而我的姐姐卻在掙扎中努力，每一次勝利都得來不易。聖母學校的一些同學對她很殘酷，我童年很大一部分時間都在保護她免受欺凌。

我很早就開始在意公平正義這件事。我們的生活充滿了矛盾，而我卻找不到任何理由來解釋這些現象。我們是雙胞胎，共享子宮，在同一個家庭長大。然而我的生活相對輕鬆，她的卻如此艱難。這該如何解釋？我想要弄明白的，不單是我姊姊生理上的處境，而是關於與眾不同這件事更深邃的意涵。

我的個人經歷反駁了精英領導制的觀念。我有證據表明成功與失敗並不完全取決於個人的努力。我開始思考人的價值。是什麼賦予了一個人生命的價值？是長相、智慧、體能、受歡迎程度嗎？還是家庭？青少年時期，我深信這個世界的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出了嚴重差錯。那是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所以我希望能為此做點什麼。

一個週日的下午，母親給我們讀了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伯明翰監獄來信”的節選：

...我深切體會到所有社群與國家之間那種環環相扣的關聯性。我不能坐在亞特蘭大，卻對伯明翰發生的事無動於衷。任何地方的不公義，都是對所有地方正義的威脅。我們被困在一個無法逃脫的互惠網絡中，繫於同一件命運的衣裳。任何直接影響一個人的事，都會間接地影響所有人...曾幾何時，教會是非常有力量的。那時，早期的基督徒因被視為配得上為信仰受苦而感到歡欣。在那些日子裡，教會不僅僅是記錄大眾意見與原則的溫度計；它更是一個改變社會風氣的恆溫器。

在1967年，當母親決定參與抵制桌上葡萄(table grapes)的運動時，她對社會正義的關懷凝結成了具體的行動。她解釋說透過拒絕購買葡萄，我們可以幫助農場勞工爭取到公平的工資與體面的工作環境。在1968年2月，塞薩爾·查維斯(Cesar Chavez)開始了禁食抗議。在他禁食期間，我們為他祈禱，焦急地等待著；看著他不進食的日子從幾天變成了幾週，而幾週又險象環生地下滑，逼近了一個半月。在二十五天後，身體極度虛弱的查維斯終於結束了禁食。我們看著電視轉播，畫面上查維斯正在領受聖體，而羅伯特·甘迺迪(Bobby Kennedy)就守在他的身側。

隨後在4月，我們在晚間新聞中看到了馬丁·路德·金遇刺的悲痛消息。家裡的氣氛低沉而壓抑，早前另一場暗殺的記憶在我們心中迴盪。

隔天早上，我在聖母學校發現了對金博士遇刺的不同反應。一小群同學站在教室前方討論這件事。當我走向他們時，聽到一位種植園主的女兒評論道：

“我很高興他們殺了那個共產黨員金，我希望下一個就是查維斯。”我停在走道中間，那些話像火燙一般穿透了我。一些欺負過我雙胞胎姐姐的孩子圍站在那群學生中點頭。在那一刻，我個人對於社會如何定義人的生命價值的疑慮，與一場更大規模的抗爭融合在了一起。我腦中閃過一個領悟：正如我的成功並非全靠自己“應得”，同樣地，在一個極度不公的社會秩序下，某些群體不勞而獲地享受著利益，而另一些群體卻在承受苦難。

分辨社會正義的召喚

在1970年，當我是聖母高中的高一新生時，我發現了一種教會，那正是金恩博士在《來自伯明罕監獄的信》中所渴望見到的那種教會。一位被派往巴西的聖母修女會修女給馬里斯維爾(Marysville)的聖母社區寄來了一段震撼人心的錄音。那段錄音帶在聖母高中的所有宗教課上被分享播放。她描述了一個由傳教士、修女、神父甚至主教組成的教會，他們每天冒著生命危險與窮人一起推動社會變革。她對巴西教會的描述讓我的心“燃燒了起來”。我渴望能像他們一樣。我回到家，告訴母親關於這個與窮人站在一起的震撼的教會，告訴她那些被監禁、甚至遭到暗殺的牧職與修道人員的故事。

母親認出了那個錄音修女的名字：

“她是我在聖荷西(San Jose)聖母高中教過的學生，年底時她送了我一個東西。”媽媽在她的首飾盒，拿出一個掛在金鏈子上的心形小金匣，左側刻著花朵。

“給，伊莉莎白，送給你。”

這個心形小金匣是母親給我的禮物，透過她的榜樣，我開始辨明自己對社會正義的召喚。

高二時，聖母高中關閉，我轉到了馬里斯維爾高中。當我搬到那裡時，感覺整個世界都打開了。淘金熱時期建立這個小鎮的各個族群依然存在：華裔、非裔、愛爾蘭裔、法裔、墨西哥裔和猶太裔。淘金熱潮過後，日本和旁遮普移民來到尤巴與薩特縣種地謀生；接著沙塵暴時期，又來了一波中西部的墾荒者。雖然學校拿印第安人當吉祥物，但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是邁杜族原住民，在現實生活中卻一點存在感也沒有。

我的社會正義覺醒在馬里斯維爾高中繼續。高二英語課，我們必須兩人一組，就一位我們欽佩的公眾人物做口頭報告。我說服了我那相當膽小的搭檔，告訴她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值得我們欽佩，儘管或許正是因為她被列入了 FBI 的十大通緝名單。我開始在縣醫院志願服務，那是窮人獲得醫療服務的地方。我加入了吹笛人俱樂部，致力於為患有唐氏症的青少年提供社交體驗。我因為參與麥戈文（McGovern）總統競選活動而獲得了公民課的學分。高三時，我也參與了美國國際文化交流協會（AFS）的活動，並贏得獎學金在高中畢業後的暑假前往阿根廷生活了十週。

1973 年 8 月我從阿根廷回來時，我已經學會了西班牙語。我進入尤巴（Yuba）社區學院，選修了西班牙語、拉丁美洲歷史和奇查諾（Chicano）研究課程。透過這些課程，我重新認識了聯合農場工人（UFW）。其中一位老師 Sal Soto 戴著一頂圓形、編織緊密的草帽，帽簷向下

彎曲，那是農場工人用來遮陽的帽子。他的背心上綴滿了 UFW 的徽章，其中一個寫著“抵制葡萄”。課後，我走向他：

“我的家人以前抵制葡萄，但我以為抵制已經結束了。”

“不！”Sal 斷然回應，並且睜大眼睛搖著頭，“你應該來參加我晚上教的另一門課，了解更多。”

投身社會運動

薩爾(Sal)開了一門叫做“農場勞工研究”的選修課。他組織了遍布整個聖華金河谷(San Joaquin Valley)的田野調查。我加入了這門課，並實地拜訪了許多地方：包括拉蒙特(Lamont)參與葡萄罷工的人們、薩利納斯(Salinas)的農場工人工會(UFW)診所，還有德拉諾(Delano)的艾格巴亞尼養老村(Agbayani Village)那是專為菲律賓農工建造的，他們曾是反異族通婚法的受害者，這項法律禁止他們結婚成家。最後，我們還去了位於貝克斯菲爾德以東、特哈查皮山脈中的 *La Paz*，那裡是 UFW 工會的總部所在地。

當我們跟著薩爾(Sal)旅行時，我們一路上會順道拜訪他的親友。在帕特森(Patterson)，薩爾未來的岳母用花園裡現採的葉子，為我們泡了香茅茶。在阿文(Arvin)，我和一對正值青春期的姊妹擠在同一張雙人床上。床單很薄，我整晚凍得發抖；隔天早晨，她們的母親進房看到我們擠在一起的樣子，忍不住笑了出來，接著責備女兒們把毯子都搶光了。隨後，她為我們準備了豐盛的早餐：有雞蛋、豆子，還有手工擀製的墨西哥薄餅(tortillas)。在吉爾羅伊(Gilroy)，我們坐在星空下的戶外，對著營火烤玉米。早晨，我們走進一家墨西哥餅店(panadería)，買了貝殼形狀的甜麵包(conchas)和帶著肉桂香氣的熱巧克力。背景音樂裡，廣播正播放著蘭切拉(rancheras)民謠。

當我們在 La Paz 過夜時，大家都在同一個大房間裡打地鋪。有一個來自尤巴 (Yuba) 城的瘦小男生叫 Victor，留著長髮、稀疏的小鬍子，笑容靦腆。他對我有好感。當我們坐著聊天時，一隻蠍子滑過地板，他殺死了它。每個人都跳起來看。然後我們抖了抖床單，檢查床底，確保周圍沒有其他蠍子潛伏。

那天晚上，我記得和薩爾還有那一群墨西哥裔同學吵得很兇。我跟他們說，不要再叫我白人或白妞了。我覺得這類標籤聽起來不太舒服，也覺得這些詞抹殺了我真實的身份，沒辦法代表我這個人。

“我不是盎格魯人，我是愛爾蘭人。”我堅持道，“我家人說英語是因為愛爾蘭被英國殖民了，愛爾蘭語曾被定為非法。我的家人因大饑荒被迫離開愛爾蘭...一百萬人餓死。愛爾蘭人坐著充滿傷寒的船來到美國，成千上萬的人在航行中死去。愛爾蘭人抵達新世界時，手裡只有他們能拿得動的財物。”雖然我的祖先的確是壓迫的受害者，但同樣事實的是，我現在是美國主流文化的一員。當時的我並未完全理解種族動態的複雜性。我憎恨種族主義，但我每天都因擁有白皮膚而從中受益。

儘管如此，白人「Anglo」這個詞仍讓我感到刺耳。無論真假，我父親認為新教徒在工作場所歧視他...身為愛爾蘭裔天主教徒讓他一生都處於劣勢。我也記得祖母和姑姑講過曾祖母的故事.....她如何在教區神父開設的秘密學校裡，躲在灌木籬笆下偷學“蓋爾語”。讓我覺得荒謬的是Sal 和其他學生稱呼我為白人 (Anglo)。我也不是白妞 (Gabacha) 至於這個詞，最初其實是源自 19 世紀侵略墨西哥的法國人。最後，他們總算答應不再叫我白人 (Anglo)，但堅持要繼續叫我白妞 (Gabacha)。他們一口咬定這沒有貶低的意思，單純只是代表我不是奇卡諾人而已。對此，我接受了。

有時 Sal 會邀請一位名叫 Pancho Botello 的前 UFW 組織者作為客座講師。Botello 英俊剷悍，笑起來眼睛裡閃爍著光芒。雖然他已不再為 UFW 工作，但他被當地農場工人廣泛視為領袖和尋求幫助的人。無論是欠薪還是工傷賠償，Botello 都了解工人的權利，並無所畏懼地捍衛他們。

Pancho 生活簡樸，住在尤巴 (Yuba) 城 Richland 住房中心的一個小的移動房屋裡。那裡大部分居民是農場工人，夏天還有大型移民營。Botello 熱愛工會，但他並不同意查維斯奉行的非暴力哲學。雖然他住在尤巴 (Yuba) 城，但他曾為工會在州內其他地方組織過。當時馬里斯維爾 (Marysville)/尤巴 (Yuba) 城地區並沒有活躍的 UFW 存在。

每當 Botello 來上課，我都會問不同版本的同一個問題：

“為什麼 UFW 不在馬里斯維爾 (Marysville) 和尤巴 (Yuba) 城組織工作？”有一天，Pancho 給了答案：

“馬里斯維爾將會有一間 UFW 辦公室，而你將要去開設它。”

我對 Botello 的提議感到驚訝和好奇。我與 Sal 和他的妻子 María 討論了這個主意，也徵詢了我的母親、兄弟姐妹和好友。在 1974 年秋天，經過深思熟慮與祈禱，我制定了一個計畫，休學一年去為農場工人工作。

我能夠從尤巴縣醫院的志願者組織那裡獲得了 1500 美元的捐款，並從 Bogue 婦女俱樂部獲得了辦公家具。雖然 1500 美元現在看起來不多，但在 1974 年，這足以支付一間臨街小辦公室一年的租金。Botello 選了一個地點，那裡曾是 DiGiorgio 罷工期間的 UFW 所在地，位於馬里斯維爾第五街橋與 Rideout 醫療中心之間的奧林匹克酒店一樓。當我打電話給 La Paz 的總部辦公室，告訴他們捐款和家具的事時，我意識到出了問題：沒人知道我在說什麼...工會根本沒有在馬里斯維爾 (Marysville) 開設辦公室的計畫。

會見塞薩爾·查維斯(Cesar Chavez)

我很困惑，去找了 Sal，Sal 隨後打給 Botello。Pancho 承認他沒有權力僱用我。Sal 要求他安排與塞薩爾(Cesar)見面，看看能做些什麼，既然我已經從尤巴學院(Yuba College)辦理了休學，而且也已經為辦公室籌得了捐款，波特羅(Botello)便點頭答應了。

一週後，我們五個人擠進薩爾(Sal)的車，沿著聖華金河谷南下，直奔特哈查皮山脈。波特羅(Botello)當時宿醉得很厲害，我們還得停下車讓他去吐。當我們終於抵達工會總部時，在警衛室辦理登記，這才發現根本沒人事先知道我們要來。波特羅完全沒跟塞薩爾(Cesar Chavez)約時間，而我們已經開了六個小時的車才來到 La Paz。警衛只好打給塞薩爾的行政助理，看能不能通融。沒想到，塞薩爾竟然答應見我們。

我們坐在塞薩爾辦公室外的木製長凳上等待。工會總部過去曾是一間結核病醫院。入口處的接待員坐在一個帶有滑動玻璃窗的小房間裡，她看起來簡直像莉莉·湯姆林(Lily Tomlin)筆下的角色“歐妮絲汀(Ernestine)”，正忙著操作一台佈滿雜亂電線的老式接線台。一間間小辦公室沿著長廊排開，地板是磨損的棕色。牆上裝飾著來自 UFW 印刷廠圖形工作坊(*El Taller Gráfico*)顏色鮮艷的海報。畫面裡有：一名兇猛的阿茲特克戰士正赤手捏碎沾滿血跡的葡萄；潘喬·維拉(Pancho Villa)挺拔地騎在馬上，背後繫著步槍；埃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在濃密的鬍鬚後嚴肅地凝視著鏡頭，胸前斜跨著子彈帶。而在薩帕塔旁邊，掛著塞薩爾·查維斯的肖像，上面寫著一段關於非暴力的名言。

終於，塞薩爾出來迎接我們，邀請我們進入辦公室。我記得他的眼睛……那雙眼睛很特別，深邃卻明亮，彷彿能把我吸進去。他的聲音柔和，帶著加州墨西哥裔特有的節奏感。他的嘴角帶著一抹若有似無的笑意。頭髮黑而直，微微泛著銀灰。他的身高和我差不多，幾乎平齊。

塞薩爾請我們坐下。他先與一年多沒見的 Botello 閒聊，然後聽 Pancho 講述我們的事。最後，塞薩爾轉向我，問我為什麼想為 UFW 工作。

“組織工作不是朝九晚五的差事，”他警告道，“不要因為想得到感謝而做這件事。沒有人會感謝你的。你必須審視內心，找到一個足夠強大的理由來支撐你。”

“我想做這份工作是因為我的信仰，”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覺得自己被召喚去從事社會正義工作。”塞薩爾沉默思索了一會兒，然後他說：

“聖瑪麗亞(Santa María)需要人，如果你真的想工作，我可以把你派到那裡。”

“不要！”我反對道，“我來這裡的唯一理由是為了讓農場工人運動進入馬里斯維爾和尤巴城。如果錢是問題，我們可以自己付房租……我可以住家裡，當志願者。”Sal、María、Victor 和 Botello 隨即向塞薩爾保證，他們致力於讓馬里斯維爾辦公室成功。塞薩爾再次沉默，他靠在椅子上思考。最後他說：

“好吧，我會在馬里斯維爾(Marysville)開設一個服務中心。」房間裡每個人都露出了笑容。隨後塞薩爾開始了一場關於如何運作服務中心的速成課。UFW 服務中心幫助農場工人處理政府項目，如工傷賠償、食品券、醫療補助(Medi-Cal)、社會保障和公共住房。中心還幫助工人申報所得稅，尋找可靠的移民律師。塞薩爾建議我永遠不要只是「轉介」工人去政府部門，而是要親自陪同，以便擔任他們的擁護者。

隨著服務中心在社區中建立起堅實的口碑，大眾對農場工人工會(UFW)的信任也與日俱增。工會提供的服務不收取任何費用，但我們會邀請每一位受益者參與工會活動。我們請工人們在自己家裡舉辦聚會，並邀請親友與同事一起來了解工會。就這樣，透過服務中心，一個由人際關係織成的網絡逐漸成形。塞薩爾要我一月份再回 La Paz，參加由老佛瑞德·羅斯(Fred Ross, Sr.)主持的培訓課程

透過服務建立關係

拜訪結束了，我們走出室外。此時正值黃昏，山裡的空氣透著寒意。我們鑽進薩爾的車，準備踏上漫長的歸途。當車子緩緩駛下山路，我感覺到全世界的重量彷彿都落在了我的肩上。那年我十九歲，即將在尤巴和薩特縣為農場工人創立一個工會服務中心。隨著這一切的重大意義逐漸在腦中清晰，我開始在心中默默祈禱……

“耶穌，請幫助我，沒有你我做不到。”

1975年1月，我回到了 La Paz。工會總部周遭險峻的山峰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積雪。主建築裡的暖氣壞了，大家都穿著厚毛衣。幾間房間裡雖然有電暖器發出嗡嗡聲，但那發光的線圈所散發的熱氣，簡直就像狄更斯筆下的小職員鮑勃·克拉奇(Bob Cratchit)僅有的那一塊煤炭一樣微弱。培訓在一間空蕩蕩的房間裡進行，窗外正對著大山。我們坐在圍成半圓形的摺疊椅上。

老佛瑞德·羅斯長得高高瘦瘦，皮膚黝黑且佈滿風霜，蓄著一頭白髮。培訓一開始，他先分享了自己與塞薩爾相遇的經過。當時佛瑞德是一名社區組織者，在聖荷西一個治安極差、名叫能逃就逃(*Sal Si Puedes*)的社區工作。在那裡，許多人都建議他一定要去見見塞薩爾·查維斯。然而，塞薩爾起初卻很排斥跟佛瑞德見面。他覺得這白人可能又是哪家大學來的研究員，專程跑來“...算算這群墨西哥人吃了多少顆豆子”。塞薩爾得先試探佛瑞德，才能決定他是否值得信任。兩人最後終於見了面，塞薩爾答應在家裡舉辦一場聚會，但他私下卻安排堂弟曼努埃爾(Manuel)去現場搗亂，想給這個外來者一點教訓。沒想到，聚會才進行到一半，塞薩爾就徹底被社區組織的這個構想給吸引住了。當曼努埃爾開始按計畫搗蛋時，塞薩爾反而得趕快想辦法讓他停下來。

塞薩爾後來加入了『社區服務組織』(CSO)擔任組織者，該機構隸屬於由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領導的『工業區基金會』(IAF)。到了1962年，塞薩爾決定脫離CSO，因為他真正的目標是組織農場工人，為他們發聲。

第一場葡萄大罷工於1965年在德拉諾(Delano)爆發。當時，隸屬於另一個勞工組織農業工人組織委員會(AWOC)的菲律賓工人們率先走出葡萄園，發起了罷工。他們邀請塞薩爾剛成立不久的組織全國農場工人協會(NFWA)加入。起初，塞薩爾並沒打算這麼快採取行動，他覺得自己還沒準備好承擔如此龐大的重任。然而，在經過兩週的慎重商討後，塞薩爾與其他領導成員最終決定投身這場罷工。

隔年，這兩個組織合併，『聯合農場工人工會』(UFW)正式誕生。透過一場全民參與的抵制運動，工會終於在1969年與葡萄種植商簽下了第一份合約。

當時，農場工人們走出聖華金河谷，散布到全國各大城市。他們出現在超市門口、民眾的客廳以及教堂的大廳，訴說著自己的故事。這讓 UFW 贏得了許多像我母親那樣、原本遠離這場鬥爭的人們的支持。最終，抵制運動所產生的經濟力量，迫使種植商不得不坐到談判桌前。

在1973年，當 UFW 準備續簽合約時，葡萄種植商效仿了薩利納斯(Salinas)生菜商的做法。他們勾結了『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s Union)，背著工人們簽署了所謂的『黃色工會合約』(sweetheart deals)。

UFW 隨即發起抗議罷工，然而這場運動卻演變成一場慘烈的暴力衝突。種植商雇用了武裝保全，在糾察線上恐嚇工人。最終有兩名工人遭到殺害，UFW 於是被迫重啟另一場全美葡萄抵制運動。

介紹完歷史後，弗雷德教我們如何組織。

家庭聚會(House meetings)是 UFW 採用的核心策略。首先，組織者會進行個別拜訪，深入了解工人們的生活...傾聽他們的故事與擔憂。接著，組織者會藉由邀請工人帶頭在自己家裡舉辦聚會，並號召親友和同事參加，來試探其領導潛力。

聚會總是從自我介紹與分享經歷開始。工人們所訴說的受辱往事，其普遍程度令人心碎：有人被惡意欠薪，有人長期暴露在農藥威脅下，甚至連田間最基本的飲用水或廁所都沒有。接著，組織者會講述塞薩爾的故事，將他的經歷與工人們剛剛表達的痛

苦連結在一起。但故事在這裡有個轉折...塞薩爾決定站出來組織大家，去改變這些不公義的工作環境。就這樣，他創立了聯合農場工人工會(UFW)。

家庭聚會的目標，是將勞工們各自孤立的故事，編織成一個關於奮鬥與轉變的集體敘事。這是一場靈魂覺醒的號召，邀請人們先勇敢說出痛苦，接著進而跨越痛苦，化為行動。組織者由衷希望工人們能認同塞薩爾組織起來的決定...進而讓在座的每個人也都能做出屬於自己的決定...共同投入這場非暴力的社會正義抗爭。在聚會結束前，每個人都會被邀請在眾人面前，逐一說出自己的下一步，或許是承辦下一場家庭聚會，或許是正式加入工會，又或者是為 UFW 捐出一份心力。

佛瑞德將我們模擬個別拜訪與家庭聚會的過程全程錄影，並對我們進行講評與鼓勵。那一週快結束時，塞薩爾親自來和我們談話。當時第二次抵制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涵蓋了葡萄、生菜和嘉露酒(Gallo Wine)等多種產品，然而勝利卻似乎依舊遙不可及。儘管處境黯淡，塞薩爾卻不曾放棄；相反地，他陷入了沉思，思考著不僅要為農場工人建立工會，更要為全美國所有的貧窮百姓成立工會。他鼓勵我們，去接觸任何正身處貧窮苦難中的人。

當我回到瑪麗斯維爾(Marysville)時，才得知波特羅選好的辦公空間還需要幾週才能啟用。尤巴城聖伊西多爾教堂(St. Isidor's Church)的畢曉普神父(Father Bishop)慷慨解囊，在位於理查蘭住房計畫區(Richland Housing Project)附近的聖菲利佩天主教社區中心(Centro San Felipe)為我們提供了臨時場地。畢曉普神父還在瑪麗斯維爾與尤巴城的西班牙語彌撒中向大家介紹我。與此同時，薩爾聯繫了美國國稅局(IRS)為志工進行培訓，好讓我們能在晚上為農場工人開設報稅診所。幾週後，UFW 服務中心終於遷入了自己的正式據點，消息也漸漸在人群中傳開了。

最初進門求助的幾位工人都受了工傷，需要協助申請勞工賠償。我清楚記得有一位年輕人，他因為被派往剛剛噴灑過農藥的田裡工作，導致身體暴露在化學毒素中。他的前臂佈滿了令他疼痛難忍的紅疹，手掌也被染成了焦黃色。我幫他填寫了索賠的初步申請表。當時的勞工賠償系統極其複雜、難以摸索，但後來我總算聯繫上一位來自迪克森(Dixon)的雙語律師。他自稱十字軍兔子(Crusader Rabbit)，每週六早上都會固定來到瑪麗斯維爾，為工人們開設勞工賠償門診。

隨著春天的到來，服務中心的業務量劇增。這歸功於 UFW 成功推動的一項立法，讓農場工人首次擁有了領取失業保險的權利。當這項新政策的消息傳開後，州政府就業局被湧入的申請者擠得水洩不通，且其中多數人都不通英語。州政府亟需協助以應對排山倒海的案件量，於是便與 UFW 達成協議，由我們負責進行申請者的初步預審

我接受了當地就業局的培訓，負責協助農場工人填寫申請表，並在面談前幫他們備齊所需文件。我始終銘記塞薩爾的叮嚀不要只做轉介，因此我親自陪同工人們去就業局面試，以確保他們受到公平的對待。之後，我會進行後續的個別拜訪，並邀請大家在自己家裡舉辦聚會。而大多數人都欣然答應了。

有時，我會前往像利夫奧克(Live Oak)或里奧奧索(Rio Oso)這類偏遠小鎮拜訪工人和他們的家。有些工人就住在種植商的土地上，那些房子躲在礫石路的盡頭，深藏在成片的桃子果園中。至於番茄農場裡的房子，則像是一粒粒微小的斑點，消融在向遠方堤道無限延伸的廣袤田野裡。許多工人則住在城鎮裡，我也因此漸漸熟悉了瑪麗斯維爾、尤巴城、琳

達(Linda)以及奧利夫赫斯特(Olivehurst)等地的農工聚落...那些隱藏在前院主屋後方的小木屋, 以及那些沒有人行道的街道。

這些家庭總是溫暖而慷慨, 一見面便熱情地招待食物與飲品。能被允許進入他們的生活, 我深感榮幸。即使是最簡陋的居所裡, 也流淌著豐富的文化、親情與信仰...牆上掛著瓜達露佩聖母的畫像, 有時畫框上還掛著玫瑰經念珠, 下方的祭壇點著搖曳的祈願蠟燭...嬰兒被包裹在柔軟的手織毛毯裡, 眼神好奇的孩子們羞怯地從母親的裙擺後探出頭來...桌上鋪著雪白的桌巾, 上面繡著色彩繽紛的花卉十字繡, 並覆蓋著透明塑膠墊細心保護著...還有那花園...那些令人驚嘆的花園, 種滿了藥草、番茄、辣椒, 還有一排排高聳的玉米。儘管廚房裡可能放著烈酒, 但他們總是端出雀巢咖啡和餅乾來款待我...我之所以受到如此尊重, 是因為我代表著塞薩爾·查維斯與聯合農場工人工會(UFW)...我代表著希望。

在春季期間, 我在尤巴(Yuba)與薩特(Sutter)兩縣舉辦了數十場會議, 在此過程中結識了數百名工人, 並深入了解了當地的農業產業。我為每一場家庭聚會做了詳盡的紀錄, 妥善保存簽到表與聯絡資訊。當塞薩爾成功說服新當選的州長傑瑞·布朗(Jerry Brown)介入UFW與種植商之間的談判時, 運動的熱度再次攀升。談判最終催生了全美首部保障農場工人組織權的法律農業勞動關係法。為了聲援這項立法, UFW動員了工人、學生以及宗教界的盟友, 在靠近嘉露酒莊(Gallo Vineyards)的利文斯頓(Livingston)舉行了一場大規模集會。最終,《農業勞動關係法》順利通過, 並由州長簽署正式生效。

一個歷史性時刻: 田間的祕密投票

由於農場工作具有季節性，該法律於 1975 年夏天立即生效。塞薩爾決定從聖地牙哥步行前往沙加緬度 (Sacramento)，藉此宣傳代表權選舉，並激發勞工的組織熱情。若要在特定農場舉行選舉，工人們必須先簽署工會授權卡，當過半數的工人簽署後，工會才能要求舉行選舉。然而，塞薩爾的行軍路線並未經過瑪麗斯維爾與尤巴城，而且看起來在沙加緬度以北似乎也沒有舉辦選舉的計畫。我打電話到 La Paz 詢問如何才能參與其中，卻被告知依法律規定，只有現場辦事處能收集授權卡，服務中心則不行。在與波特羅和薩爾商量後，我決定趕上塞薩爾的行軍隊伍，當面請求將我們的辦公室身分從服務中心轉為現場辦事處。

當我們這支來自瑪麗斯維爾 (Marysville) 的隊伍加入行軍行列時，我努力擠向隊伍最前方，穿過隨行的保全人員，只為了能與塞薩爾說上話。我們一邊走著，他一邊詢問我舉辦了多少場家庭聚會，以及有多少工人參與其中。當我報出數字時，他顯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於是，我伸手進背包，掏出了那一疊簽到表。塞薩爾快速地翻閱著，不可置信地搖了搖頭。

“好。我要把你們的身分變更為現場辦事處 (field office), ”他說。我們再一次滿懷喜悅地踏上歸途。

那是六月下旬，遷徙季節勞工開始湧入，準備迎接夏季採收。理查蘭住房中心的政府營區擠滿了新面孔，許多車輛掛著德州的車牌。瑪麗斯維爾與尤巴城內每一間空房、木屋，甚至是破舊的旅館房間，都被那些渴望在桃子與番茄產季大幹一場的家庭或單身漢擠得滿

滿當當。在過去的冬春兩季，我們已在當地勞工中建立了穩固的支持基礎；而現在，我們必須針對這些遷徙勞工進行高強度的組織行動。

我得到了一筆預算，聘請了四名農場工人以及一名來自尤巴學院(Yuba College)的 **Movimiento Estudiantil Chicano de Aztlán** 成為組織員。此外，工會指派了一位名為彼得·哈伯費爾德(Peter Haberfeld)的律師，負責處理受農業勞動關係委員會(ALRB)監管的代表權選舉法律事務。彼得早年曾在加州農村法律援助處工作過，對瑪麗斯維爾非常熟悉。他後來成了我的終身摯友，多年後我們還在奧克蘭的學校體系中並肩作戰。彼得和我在瑪麗斯維爾有共同的朋友，包括哈里斯(Harris)一家。當時一位年輕的黑人學者兼運動者誇希·哈里斯(Kwasi Harris)也加入我們，協助了為期兩週的選舉運動。與此同時，波特羅在尤巴城的委員會(Concilio)也因為獲得了聯邦撥款，擁有了自己的員工。雖然他無法直接參與組織工作，但他利用自己的人脈為工會提供了極大的助力。

UFW 決定將全加州的行動重點放在番茄產業，因此我們也將地方上的重心轉向尤巴(Yuba)、薩特(Sutter)及科盧薩(Colusa)縣的番茄農場。當時的番茄採收小組配合採收機全天候輪班運作。我們只能利用工人們換班前後，或是午休時間與他們接觸。工人們會主動打電話給我們，告知小組所在的方位，因為隨著採收進度在不同田野間轉移，地點每天都在變換。我們在黎明、正午、黃昏、甚至午夜時分出動，只為了與工人們說上話。我們會詢問他們的聯絡資訊，隨後再前往他們的住所進行後續拜訪。

住在政府營區裡的難民享有免費的醫療與托兒服務；然而，對於住在營區外的難民來說，健康成了首要的隱憂。我記得有一對年輕夫婦住在桃子果園邊緣的一間簡陋木屋裡。他們

的水源來自室外的水龍頭，甚至還拿一個廢棄的農藥容器來洗碗。在另一個家庭中，孩子們看起來營養不良，或許還遭受著寄生蟲的折磨。那些孩子以他們的年齡來說顯得極其瘦小，眼下帶著深沉的陰影。而他們的父母卻體重超標，皮膚鬆弛且蒼白。一般來說，要讓難民對 UFW 產生興趣並不難，他們很快就加入當地人的行列，紛紛簽下了工會授權卡。

在希羅塔兄弟 (Herota Brothers) 農場取得首場選舉勝利後，我們接連在卡特農場 (Carter Farms)、哈爾西農場 (Halsey Ranch) 與太平洋農場 (Pacific Farms) 旗開得勝。

當然，我們也輸了幾場選舉。在其中一個農場，我們啟動組織工作的時間太晚，產季只剩下兩週。雖然那裡的常僱工人是堅定的查維斯支持者 (Chavistas)，但採收小組全是由來自墨西哥的無證移民工組成，事實證明，他們極易受到資方的恐嚇。另外，我們贏得了一家名為安德森農場的跨州大企業在薩特縣的選區，但遺憾的是，該公司在南方其他縣份的選舉卻以失敗告終。

當番茄採收季節結束時，塞薩爾要求我前往納帕 (Napa)，協助當地酒莊工人進行代表權選舉。

工人們很高興有工會人員被派駐到納帕谷 (Napa Valley)，但他們並不希望我直接參與收集授權卡的過程。相反地，他們希望我在聖海倫娜 (St. Helena) 開設一間辦事處，作為工會在該河谷存在的公眾形象。那年秋天，UFW 在納帕谷贏得了幾場代表權選舉。雖然我十分欽

佩這些工人的自給自足，但我也覺得自己有點像個門面點綴。當十一月下旬採收季結束時，我請求塞薩爾(Cesar)讓我回到瑪麗斯維爾。

我定期前往拉巴斯(La Paz)參加分處主任會議。聯合農工工會(UFW)的全體董事會成員經常出席這些會議，並在主任們面前辯論策略與後續步驟。當時年僅 20 歲的我，覺得自己無比幸運，能親眼目睹歷史在面前展開。

在 La Paz 的其中一次會議期間，兩名志工結婚了，現場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派對。酒水不停地供應，儘管我還不滿 21 歲，我也喝了不少。每個人都在跳舞，我也在其中。令我驚訝的是，塞薩爾竟然邀我跳舞。那是多麼令人激動的事！我當然說了“好”。但當音樂結束了，塞薩爾並沒有離開，反而想繼續跟我跳下去。接著好幾首歌過去了，在某個時刻，一對男女跳到了我們身邊。當塞薩爾背對著那名女子時，她對我做了一個極其誇張的手勢，用手在喉嚨前比了一個割喉的動作，並用嘴型對我說著我聽不懂的話。我被嚇到了，音樂一停，我就告訴塞薩爾我需要上廁所。我躲到了外面，法律部門的一位律師朋友瑪麗·莫辛(Mary Mocine)跟了出來。很快地，剛才那位對我比手勢的女子也加入了我們。她解釋說，因為塞薩爾一直跟我跳舞，他的妻子海倫(Helen)正在吃醋。她說我對海倫非常不尊重。我感到羞愧至極。我謝謝她告知我這件事。瑪麗問我還好嗎，並建議我或許該回房睡覺，結束這一晚了。但在我看來，夜才正要開始，我不想回房。我答應不再跟塞薩爾跳舞，便回到了室內。我一進門，一名站在門邊的農場工人立刻邀請我跳舞。那是一位與我年紀相仿的年輕契卡諾人(Chicano)，我很高興能再次享受派對。才跳了兩首歌，塞薩爾就過來拍了拍那個男孩的肩膀(要求換人跳)。“看著妳跟那個男孩子跳舞，我真的好嫉妒。”他在我耳邊低聲說道。那一刻，我終於明白為什麼瑪麗要我離開派對了。我必須離開那裡。那首歌一結束

我就走了。這一次，我感到一陣眩暈，瑪麗再次出現在我身邊。她陪著我走回房間，確保我平安抵達。

隔天，聯合農工工會(UFW)董事會與各分處主任繼續開會。在下午休息時間，塞薩爾走過來找我聊天。“妳是個蛇蠍美人(**femme fatale**)，”他這麼說。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我算是有點姿色，但屬於那種平實的類型，跟我心目中那種美艷奪目的“蛇蠍美人”形象完全不沾邊。我處於一種尷尬的境地——那是男生通常會歸類聰明女孩的範疇。我既非純潔無瑕，也不放蕩不羈。在我開始為工會工作之前，波特羅(Botello)曾告訴我，作為一名工會組織者，我是不會有時間交男朋友的。這曾讓我對這份工作產生過動搖。我去跟薩爾(Sal)談過，他聽完笑了起來。“莉茲(Liz)，”他安慰我，“如果妳是一個出色的組織者，我相信妳一定能『組織』出時間去約會的。”或許我之所以把波特羅的告誡看得這麼重，是因為當時聖母修女會(Sisters of Notre Dame)正積極招募我加入她們。我也確實一直在考慮這件事。修女們會陪我參加工會遊行，而我則會在週三晚上去修道院和她們一起祈禱。那年我 20 歲，生命中還有許多事情正試著理出頭緒。

幾週後，發生了一件怪事。塞薩爾打電話給我，說他要寄一個包裹給荷西·路易斯(Jose Luis)的女兒；荷西是波特羅的一位同事，也是 UFW 的死忠支持者。塞薩爾特別交代，當包裹寄達時，他要我親自交給那個女孩。他不准我託任何人轉交，一定要我本人親手遞給她。雖然這個要求聽起來很怪，但我還是答應了。包裹寄到後，我打給荷西，告訴他塞薩爾寄了東西給他的女兒，並指名要我親手交給她。我們約好了去他家拜訪的時間。當我抵達時，荷西與他的妻子瓜達露佩(Guadalupe)正興奮地等待著。他們把女兒從房間裡叫出來，我們四人一起坐在客廳裡。他們的女兒是一名高中生，長得很漂亮，留著一頭垂到腰際的烏

黑濃髮。在她父母與我的注視下她打開了包裹。她拿出裡一張塞薩爾的親筆簽名照，照片中的他看起來就像個電影明星。

“喔 我的女兒(mija)，這是多麼大的榮幸啊，”瓜達露佩(Guadalupe)說道。我多待了一會兒，隨口聊了幾句，但氣氛始終令人尷尬。接著，我想起了塞薩爾在舞會上對我說的話：他說看到我跟那個男孩跳舞時感到“嫉妒”。有那麼一瞬間，我甚至懷疑塞薩爾是不是想讓我吃醋，但我很快就屏棄了這個念頭，覺得這簡直荒謬透頂。隨著時間推移，我對這樁怪事發展出了一套解釋，大約是“名氣讓塞薩爾沖昏了頭”。在 70 年代，沒人談起關於過“誘姦／建立關係”(grooming) 這個詞，我壓根沒想到那個女孩可能正處於危險之中。如今，五十一年過去了，多虧了紐約時報的報導，我終於明白了。

UFW 在全加州贏得代表權選舉的勝利，在加州農業綜合企業界激起了強烈的震撼。種植商開始遊說州議會，要求阻斷給予農業勞動關係委員會(ALRB)的新資金。沒了經費，這條法律農業勞動關係法根本無法實行。在 1976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農場工人的組織權被迫陷入停滯。UFW 隨即展開反擊，發起了一項公投提案(initiative)。這項『第 14 號提案』(Proposition 14) 旨在將 ALRB 的經費來源納入州憲法，使其不受農業綜合企業影響力的干涉。遺憾的是，儘管 UFW 傾盡全力進行組織動員，第 14 號提案最終仍以失敗告終。塞薩爾對此感到痛心疾首。就在那之後不久，La Paz與現場辦事處之間的溝通調性開始發生了變化。

早期預警信號

我記得曾參加過一場針對現場辦事處主任召開的不尋常的電話會議。塞薩爾在會中描述了他對工會的願景：那將是一種新型態的共同體，所有的資源都將共享，且所有的溝通都必須透明。塞薩爾接著說，很快地，各個辦事處都將透過科技串聯起來，而他只要撥動一個開關，就能監控全加州境內任何地方正在進行的對話。在那個距離手機與網路時代還極其遙遠的年代。這番話聽起來隱約感到不安，像是老大哥在監視人民，但同時又顯得有些異想天開。我當時把這番言論斥為塞薩爾又一次的烏托邦式幻想。就像他以前提過的窮人工會一樣，這永遠不會實現。

但在接下來的幾週內，我開始聽到關於另一件事的傳聞……那就是希納農遊戲。塞薩爾希望所有 UFW 的工作人員最終都能參與這場遊戲，目的是為了建立他在電話會議中所描述的那種集體認同感。第一批參與者對這場遊戲的描述令人深感不安。個人會被安置在由八到十人組成的圓圈中央，坐在所謂的“熱座”上，然後遭受言語上的圍攻。沒有人可以為自己辯護。對該成員提出的指控不一定要是事實，謊言甚至是這場遊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La Paz 總部，唯一能倖免於這場荒誕操練的，只有少數幾位修女。

一種幾乎可以觸摸到的猜忌與不信任感，開始在 UFW 內部蔓延。我聽到了一種關於組織文化轉變的合理解釋：塞薩爾相信，第 14 號提案的選戰是被內部的共產黨滲透者給破壞了。他正利用希納農遊戲作為工具，企圖將那些不忠誠的工作人員揪出來並予以肅清。

就在這段內部矛盾頻仍的時期，州議會投票通過恢復對 ARLB（農業勞動關係委員會）的撥款。工會決定將組織重心轉向鮮食葡萄產業。1976 年 12 月初，瑪麗斯維爾（Marysville）辦

公室關閉，我被調往科切拉(Coachella)，在埃利塞奧·梅迪納(Eliseo Medina)的手下進行組織工作。UFW 當時希望在那些曾經因私相授受的協議而輸給卡車司機工會的農場重新舉行選舉。UFW 的這場組織行動，旨在迫使卡車司機工會要麼真心實意地為農工服務，要麼就徹底撤出這片田野。

新戰場

科切拉(Coachella)的組織環境與瑪麗斯維爾—尤巴城地區，也與納帕谷(Napa Valley)截然不同。在北加州，農工組織工作的主要障礙是種植商的恐嚇，工人們害怕被開除。然而在科切拉，還存在著另一個額外的障礙：對 UFW 的幻滅感。工會在管理第一批合約時步履蹣跚。科切拉的農工對 UFW 招工大廳運作中的偏袒行為有許多抱怨(或稱 *quejas*)。他們同時也抱怨 UFW 健康保險計畫拒絕給付津貼。由於招工大廳的運作被證明問題重重，工會最終決定廢除這一概念。針對第二項抱怨(*queja*)，工會建立了一套評估與補救系統，用以處理工人對保險計畫拒絕承保的投訴。

我被指派負責兩座鮮食葡萄農場的組織工作。分配名單寫在大張的掛圖紙上，張貼在辦公室的最前方。當我找到自己的任務並寫下這兩座農場的名字——Carian 和 KK Larsen 時，兩名男性組織者開始嘲笑我的分配。我轉過身，當面與他們對質。

“你們為什麼笑我的農場？”我問。

“妳分到了 KK Larsen,”他們回答道。“那簡直是個笑話。沒人能在那裡搞得起組織。”我後來才得知,在第一次葡萄抵制運動期間, KK Larsen 曾出錢雇用了一群他的農工,讓他們在全國各地跟蹤 UFW 成員,並到處宣揚反工會的故事。這位種植商對 UFW 有著近乎病態的敵意,而且在他手下工作的人當中,至少有一個大家族也是堅決反對 UFW 的。

但我同時也了解到,對於埃利塞奧·梅迪納(Eliseo Medina)而言,根本沒有所謂的“玩笑”的任務。我被要求必須以投入谷地其他農場同樣的熱忱,去組織 KK Larsen。我被分配到了由大衛·馬丁內斯(David Martinez)領導的組織小組。我認識大衛,因為他曾在瑪麗斯維爾和尤巴城與種植商進行過合約談判。在科切拉的第一天,我參加了下午的幕僚會議,聽著組織者們談論他們在午休進場時段接觸到的工人。我辨認出了一個來自尤巴城的移民家庭的名字...貝塞拉家族(the Becerras)。他們當時正在一座柑橘農場工作,而父親在那天簽署了授權卡。埃利塞奧將那張授權卡交到我手中說道,

“我們去拜訪他們吧,我陪妳一起去。”我知道埃利塞奧(Eliseo)是在考驗我,心裡不免感到緊張。我暗自祈禱這就是我所認識的那個格拉西亞諾·貝塞拉(Graciano Becerra),而不是一場尷尬的陌生拜訪。在城郊一群低矮、像棚屋一樣的建築群中,埃利塞奧(Eliseo)幫我找到了那位工人的家。我敲了敲門,一名婦女隔著門應了聲,卻沒有開門。

“你是誰?”她大聲吼道。

“我是尤巴城農工工會的利茲·沙利文(Liz Sullivan)!”我隔著大門回喊道。

“誰?”她再次問。

“我是尤巴城的利茲(Liz)。我在 UFW 工作。”門開了一道縫，那名婦女探出頭來，眯著眼打量著我：

“利茲(Liz)？”她驚訝地說。接著她轉過身朝丈夫喊道：“老頭子(Viejo)，快看！是尤巴城那位農工女孩(*la campesina*)！”她大聲笑著，並把大門敞開，邀請我們進屋。全家人都驚訝地圍了過來。埃利塞奧(Eliseo)在一旁輕聲笑了聽著他們給我取的綽號*la campesina* (農工女孩)。他們為我們端上肉桂咖啡(*café con canela*)，並跟我們聊起他們正在工作的農場情況。

“我不必擔心妳了，利茲(Liz)。”我們離開時，埃利塞奧(Eliseo)這樣說道。“妳會做得非常出色的。”

我在科切拉的工作人員中交到了一個新朋友：梅塔·門德爾(Meta Mendel)，她是個來自舊金山、嬌小年輕的女性。梅塔(Meta)與她的男友魯迪·雷耶斯(Rudy Reyes)同住，魯迪是一位菲律賓裔農工，曾是 1965 年德蘭諾(Delano)大罷工最早期的參與者之一。我抵達科切拉後不久，他們便邀請我到家裡吃晚飯。魯迪(Rudy)簡直就是住在農場邊緣的一間簡陋小屋裡。他用隨手撿來的零碎物件，巧妙且富創意地裝飾了那個空間...那些被丟棄的尋獲物被賦予了實用與藝術的雙重目的...那是一個奇幻的避風港，一個從外面絕對無法想像的世界。魯迪(Rudy)為我們準備了晚餐，我也在那裡第一次嚐到了菲律賓春捲(*lumpia*)。

在科切拉的選舉運動中，梅塔(Meta)和我是僅有的兩名被指派負責農場組織工作的女性。雖然科切拉的工作人員中有許多女性，但她們並非組織者。有些人在服務中心工作，有些

在診所或法律部門，還有些人則在辦公室擔任行政支援職務。魯絲·夏伊 (Ruth Shy) 曾是一位修女，在埃利塞奧 (Eliseo) 到來之前擔任辦公室主任，現在則負責督導一個組織小組。

梅塔 (Meta) 和我經常一起下田，互相扶持。梅塔 (Meta) 被指派負責一座大型柑橘農場。我喜歡在清晨陪她去柑橘林。我們會在黎明前起床，開車深入谷地，前往工人們集結的地方。工人們必須等到氣溫達到一定程度後才能開始採摘，否則果實吃起來會是酸的。等待時，工人們會生火暖手、訴說往事。我們看著太陽從東方的山巒升起，一道金色的光輝在粉紅色的雲彩間閃爍。

柑橘林與葡萄園的土壤是沙質的。當我抓起一把沙子讓它從指縫間流下時，會出現細小的貝殼碎片。人們說“Coachella”這個詞源自西班牙文的 *conchilla*，意思是“小貝殼”。在沙質的農場小徑上開車很困難，因為車輪有時會失去抓地力而打滑。我學會了在輪胎下鋪紙板來讓車子重新啟動，但我還需要有人幫忙把車往前推。

沙漠景致奇特而美麗。高聳的椰棗林形成了一片遮陽頂篷，投下深邃清涼的陰影並吸收了聲音。人聲與足跡只能傳遞很短的距離，隨即靜默地落在地上。椰棗農工年輕、矯健且不畏高。在安全帶的輔助下，他們能攀爬兩三層樓高的樹幹，採集頂端沉甸甸的椰棗串。椰棗奶昔是 UFW 組織者最喜愛的甜點。我們常爭論 Hadley's 還是 Laflin's 的奶昔最棒... Hadley 的奶昔很濃稠且帶有果肉，但我更偏愛 Laflin 那種帶有肉豆蔻清香的順滑口感。

偶爾襲來的風暴會讓科切拉的街道與人行道覆蓋上厚厚的積沙。公路上的人行視距會降至零，空氣轉為一片昏褐。沙塵透過門縫與窗框鑽進屋內。我們蒙住臉以避免吸入細小的微粒，砂礫滲入我們的頭皮、鞋子，以及衣物的摺皺中。而當下雨時，一切都會被淹沒。在一場暴雨過後，我們冒險進入沙漠，去尋找一種罕見的開花仙人掌。我們在一條乾涸的河床中看見四散的巨石，旁邊立著警告閃洪的危險告示。這片土地看起來如此荒蕪，連一絲水流都沒有。危險的洪水怎麼可能突然憑空出現？水究竟從何而來？然而當地人向我保證，激流確實會席捲沙漠，讓人措手不及並將其捲走。我百思不解，一個人怎麼會在沙漠中淹死？在瑪麗斯維爾(Marysville)，我們清楚危險的來源，並修築堤壩來保護我們自己。

皮特·維拉斯科(Pete Velasco)是 UFW 的秘書長，也是當初參與德蘭諾大罷工的菲律賓裔元老之一。他來到科切拉視察工會車隊。UFW 的車隊成員大多由普利茅斯 Valiants 和道奇 Darts 組成，而我的車是個例外，那是一輛雪佛蘭 Malibu。那是夏天在瑪麗斯維爾與我一同工作的一對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年輕夫婦捐給工會的。他們把這輛車命名為“Crisco(大白油)”，因為它又大又白，活像一坨在平底鍋裡快要融化的酥油。當皮特·維拉斯科走到這輛雪佛蘭前時，他皺起眉頭大喊：

“這些輪胎全磨平了！”他轉過頭，嚴厲地看著我並搖著頭說。“輪胎必須立刻更換。”隨後他的神情柔和了下來。“我關心的不是車，而是車裡的人。妳這樣開車太不安全了！”說完，他便轉身繼續檢查下一輛車。

1976 年的聖誕節，埃利塞奧(Eliseo)給了我們兩天假，這段時間並不足以讓我趕回瑪麗斯維爾。於是，我開著換了新輪胎的雪佛蘭去了洛杉磯的查克叔叔(Uncle Chuck)家，與他的

家人一起慶祝。查克叔叔是我的教父，這次驚喜拜訪讓他非常開心。他的女兒凱蒂夏天曾與我共事，她告訴了他我最需要的聖誕禮物：一只手錶。

脆弱與風險

我回到科切拉，繼續與分配給我的農場工人建立聯繫。KK Larsen 農場真的是一個極其艱困的組織環境。在一次進場時段，當我走在葡萄藤間與工人交談時，人們開始用一種我無法理解的怪異眼神向我示意。接著，那一排的下一位工人轉過身來，正是 KK Larsen 本人。他是一個高大、年長、體格魁梧的白人，身上卻穿著典型的墨西哥服飾：大草帽和薩拉佩披肩。我不記得我們之間交談了什麼，但他的訊息無需言語。

在幾次拜訪 Larsen 農場後，我遇到了一對想進一步了解工會的年輕墨西哥夫婦。他們習慣把車停在工作長排的盡頭，並隨著工作進度定期移動車輛，因為他們年幼的孩子就在車裡。他們用毯子擋住陽光，並讓窗戶微開通風。但這是在沙漠，我立刻對孩子的安全感到擔憂。當晚我到家裡拜訪他們，他們解釋說 Larsen 先生定期與工人開會，並承諾要為他們蓋房子。他描繪了一個集體村莊的願景，每個人都能在那裡得到所需的東西。這與塞薩爾將 UFW 視為一種新型態社群的願景產生了奇異的共鳴。我問他們是否相信種植商真的會蓋房？他們笑了笑，坦承這不太可能。接著我提到了孩子被留在車裡的事，並提議我去查查是否能幫他們找到托兒所。他們對托兒所可能性的懷疑，就像對種植商蓋房子的懷疑一樣。我知道在尤巴城有專門給移民農工的免費托兒所，希望科切拉也有類似機構。但當我詢問 UFW 服務中心時，主管告訴我科切拉谷地的公立托兒所排隊名單很長。這對夫婦可以填一份申請候補一個名額，但無法立即解決問題。

相較於 KK Larsen, Carian 農場是個更直接的組織環境。大多數工人是住在農場工寮裡的男性。農場有四個營區，但冬季修剪季節只開放兩個：鎮東的“菲律賓營”和鎮西的“墨西哥營”。菲律賓工人大多是老先生。其中一位名叫潘丘(Pancho)，他會彈吉他，喜歡唱 Freddie Fender 的歌。

某個週日下午我拜訪菲律賓營時，發現工人們聚在外面圍成一圈，大聲叫喊並比手畫腳。走近一看，驚訝地發現一場鬥雞正在進行，雞腿上還綁著刮鬍刀片。工人們邀請我留下來，但我找個藉口離開了。墨西哥營位於連接科切拉與鄰鎮印地歐(Indio)的公路上。工人的營舍位在葡萄園中心，就在種植商豪宅旁邊。墨西哥營的基調比較壓抑，酒精隨處可見……因為種植商提供了整桶的生啤酒。

一位來自薩利納斯(Salinas)的 Chavista(工會支持者)名叫盧佩(Lupe Iñiguez)，住在墨西哥營。他在冬季修剪期來到科切拉，暮春時再回到萵苣田。他警告我，在六月採收的高峰期，領班計畫把整個家族從哈利斯科州(Jalisco)接來採葡萄。盧佩(Lupe)認為，當這麼多工人都與領班有親戚關係時，要贏得代表權選舉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將這情報分享給大衛和埃利塞奧，但他們似乎並不擔心，叫我繼續組織。

農場裡還有一位來自墨西卡利(Mexicali)的前工會追隨者與他的兒子一起工作。在第一份 UFW 合約期間，他的妻子重病卻被拒絕給付醫療福利，最終去世。這位老人身上有種讓我喜歡的特質：沈默、勤奮且有尊嚴……是一個正直的人。儘管他對工會未能支付妻子醫療費感到痛苦與被背叛，但他與我說話時始終保持禮貌。我仔細記錄了他的資料並轉呈 La Paz 總部審核。幾週後，La Paz 回覆說對他無能為力。

1977 年 2 月初，在組織者進行了數週的家訪後，埃利塞奧決定舉行第一次總體會員大會。計畫是讓當地小學禮堂坐滿熱情的工會追隨者，為選舉活動造勢。

大會當天下午，大衛·馬丁內斯召集了他的小組。我們圍坐長桌報告各自農場的動員人數。組織者之間存有一種良性的競爭心理，看誰能帶更多工人來。大衛讓我們士氣大振，做最後衝刺。

我和梅塔 (Meta) 在出發前簡短交談。我決定去墨西哥營，因為那裡人多，且兩個營區的工人都承諾會參加。我開著車穿過葡萄園的沙路，走在長長的營舍間發放傳單。兩名年輕人接過傳單並說他們需要搭便車。他們的興趣讓我驚訝。根據過去一週的交談，我的名單上並沒有這兩個人。

其中一人，是那位因醫療給付被拒而喪妻的前支持者的兒子。我跟他只有泛泛之交，僅止於見面會打個招呼的程度。另一位則是領班的兒子。我從不跟他交談，因為我覺得那是浪費時間。我對他參加會議的動機感到懷疑，認為他可能是來刺探情報。在回答要不要載他們之前，我遲疑了一下。那時已沒時間進行深入家訪來了解他們的動機。我渴望隔天早上統計人數時能名列前茅，於是衝動之下，我接受了他們的說法，同意載他們去會場。

大會很成功，大批群眾擠出了禮堂門口。埃利塞奧站在台前演說。我不記得太多發生過的細節，除了那兩個搭我車的工人消失了。他們在中場離開後就再也沒回來。會議結束後，埃利塞奧(Eliseo)趕往機場飛往中西部處理抵制運動的麻煩。

卡羅(Carol)是一位來自明尼蘇達州、面色紅潤的金髮女孩，她是埃利塞奧(Eliseo)的行政助理。當人群散去時走過來找我，邀請我參加在科切拉格雷斯街(Grace Street)那棟房子舉辦的派對。起初我說“好”，但那兩個工人又出現了。“我盡量趕過去，但我得先載他們回家。”我告訴卡羅(Carol)。

葡萄園中的暴力

在開車回農場的路上，那兩名年輕人開始問我一些私人問題...我住在哪裡？我的家人來自哪裡？我是如何加入 UFW 的？當我們接近營區的轉彎處時，他們問是否可以去我家。這個請求很不尋常，我遲疑了一下。

組織工作的目標是賦權給那些被推向社會邊緣、變得隱形的人，然而組織者與工人之間起初存在著權力不對等。任何工會或社區組織的紀律之一，就是去管理這種不對等，讓組織者在人們開始行使自身權力並互負責任時，逐漸退居幕後。

組織者花費大量時間待在人們的家中，並深入地進入他們的生活。我們聆聽他們的故事，結識他們的家人，並理解他們的恐懼、希望與夢想。具有變革力量的關係應該是互惠的，

一位優秀的組織者會分享自己的故事，但同時也保持專業的距離。我們所建立的關係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然而，在最理想、最平等的世界裡，工人受邀去組織者家作客，難道不該像組織者去工人家中那樣受到歡迎嗎？當年二十一歲的我，始終在這些問題中掙扎。

我們接近了營區的轉彎處，我決定冒個險，讓工人看看我與其他 UFW 工作人員在印地歐 (Indio) 合租的公寓。然而，我試圖為這次拜訪建立一個公務框架，主動提出要給他們看一本剛出版的、關於塞薩爾的書。當我們抵達 JLJ 公寓時，他們進屋坐在沙發上。當大衛·馬丁內斯 (David Martinez) 手裡拿著一盤食物從廚房走出來時，他們顯得很驚訝。我試圖解釋 UFW 工作人員的集體生活安排，但他們困惑的表情揭示了文化隔閡。在他們的觀念裡，一對沒有血緣關係、也沒有性關係的未婚男女，絕不可能同住一個屋簷下。我給他們看了那本關於塞薩爾的書，他們翻了幾頁後便失去興趣，便要求回營區。

再次接近轉彎處時，他們要求我帶他們去另一個地方……幾英里外的一家菸酒商店。我對這個要求感到惱火，但還是載他們去了。當我坐在停車場等候時，我曾考慮乾脆把他們丟在那裡直接回家。然而我最終放棄了，因為如果我把工人困在離營區幾英里的地方，可能會引發惡感，讓組織工作變得更困難。

他們帶著啤酒出來並遞給我一罐。我告訴他們我不想喝，因為明早得早起陪梅塔 (Meta) 去柑橘林。我們回到農場，我轉進一條聯外道路，開過一排排長長的葡萄藤朝營區駛去。就在葡萄園中心，車輪陷入了沙地裡。旋轉噴灑器由上而下灌溉著葡萄藤，水流斷斷續續地打在車頂上。

“我們需要下車推車，”我告訴他們，希望我們不會被噴灑器淋得濕透。他們喝著酒，完全沒有下車的意思。接著，其中一人說：

“我們想跟妳發生性關係。”一種反胃感瞬間傳遍全身，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正處於險境。我知道我必須下車，遠離他們。

“我不想發生性行為。”我說。我打開車門，走出了那輛雪佛蘭(Chevy)，開始往遠處走。他們下了車跟在後面。我開始奔跑，他們便在後頭追趕。他們追上了我，將我推倒在地。我奮力掙扎想逃離，但他們抓著我的雙腿，將我拖過潮濕的沙地，拖回車邊。他們把我抬起來，塞進後座。那位前支持者的兒子跟我一起進了後座，而領班的兒子則坐進前座。

我又踢又打他，大喊著：“不！放開我！”他扯下我的牛仔褲和內褲，接著撕開我的上衣。我不斷推開他。他推起我的胸罩並壓在我身上，雙手抓著我的乳房。我繼續拳打腳踢，試圖把他推開。接著，他用手死死地捂住我的口鼻，威脅說如果不停止掙扎就要悶死我。當我無法呼吸時，恐慌傳遍全身，我害怕他真的會殺了我。我癱軟了下來，接著他進入了我的身體。當他進入時，我記得自己離開了身體，去到一個我從不知道存在的地方，一個他觸碰不到的地方，就在車頂附近的某處。

“這白痴正在強暴我。”我想著。“不知道這要持續多久。”我能聽到噴灑器的水流拍打車頂的聲音。當我待在這個奇異的新避難所時，我完全失去了對時間流逝的感覺。

直到他從我身上翻開，我才重新回到自己的身體裡，隨之而來的是赤裸所帶來的羞恥感。我能感覺到強暴者的身體就在我身旁，聞到他呼出的啤酒臭氣。他的朋友坐在前座喝著酒。我想站起來，卻不敢動彈，恐懼讓我全身癱瘓。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是結束了，還是另一個人也會強暴我。

接著，他們交換了位置，領班的兒子壓到了我身上。我再次進入那種抽離的狀態，等待著結束。當他完事後，他翻到了一旁。車內充斥著啤酒與精液的惡臭，而他們兩人都睡著了。

我想動，卻動不了。我等待著，試圖凝聚勇氣...我不知道過了多久。當我終於能移動手臂時，心臟劇烈地跳動著。我把手伸向腳踝，拉起內褲和牛仔褲，接著拉下胸罩。我襯衫上的扣子全被扯掉了。我緩緩坐起身，小心翼翼地讓自己坐直，然後伸手打開車門。當我雙腳著地站起來時，他們開始驚醒。其中一人問，

“妳要去哪？”

我沒有回答，開始走在那條潮濕、佈滿沙子的路上，祈禱著他們不要跟上來。

“嘿，妳要把妳的車留在這嗎？”另一個人大喊。

我持續平穩且冷靜地走著，直到離車子夠遠後，我開始沒命地狂奔。我在漆黑的葡萄園中奔跑，希望能找到出口。終於，我來到了一條鋪設好的公路上，試圖辨認方向。我意識到這條路通往梅塔(Meta)和魯迪(Rudy)的家。那會是很長的一段路，但那是我唯一能想到可以去的地方。

我開始走在路邊，用雙手緊緊抓著破裂的襯衫。一輛車駛過，恐慌感瞬間襲來。萬一是他們在找我呢？或者又是另一個心懷不軌的男人？突然間，我覺得自己如此脆弱。我離開了鋪設好的路肩，躲進路邊柑橘林與椰棗林投下的陰影中行走...試圖保持隱蔽。終於，我抵達了梅塔(Meta)和魯迪(Rudy)的家。門前有一片菜園，蔬菜的綠葉在月光下閃閃發亮。我敲了敲門，等了幾分鐘，然後再次敲門。

“是誰？”梅塔問。

“是利茲(Liz)。我出事了，我需要幫助。”梅塔打開了門。

“發生了什麼事？”

“我被強暴了。”她讓我進去，我告訴了他們整件事。當時我狼狽不堪，全身沾滿了啤酒、沙子和精液。

“妳想洗個澡嗎？”梅塔提議。

“好！”我回答，我只想洗掉身上那股屬於他們的惡臭。

淋浴間是魯迪的即興創作之一，位在室外的花園裡。我拉上浴簾，脫下衣服，打開水龍頭。梅塔坐在淋浴間旁陪我，魯迪則在屋裡等候。水流非常舒緩，晨間的空氣讓皮膚感到清涼。當我抹上肥皂讓水沖洗全身時，東方的天空正透出微弱的灰色晨光。梅塔遞給我一條毛巾和一些乾淨衣服，但她身材嬌小，她的衣服我不合穿。於是她拿了魯迪的一些衣物給我換上。

“妳想洗衣服嗎？”梅塔問。

“想。”我說。我們開車去了一家自助洗衣店，趁著衣服在洗衣機裡攪動、在烘衣機裡翻滾時喝著咖啡。我們討論接下來該怎麼辦。我不想向警察報案，因為科切拉谷地的政治氣氛非常緊繃，警察絕非我們的朋友。我擔心這場官司最後不會聚焦在我與那兩名男子身上，而是變成 UFW 與種植商之間的角力。我也害怕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我決定告訴大衛(David)，因為他是我的直屬主管；以及魯絲·夏伊(Ruth Shy)，因為在埃利塞奧(Eliseo)不在時由她負責辦公室。我們開車前往工會辦公室，我將發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訴了大衛與魯絲。

生存與沈默

路絲(Ruth)從診所帶了一位護士過來，護士給了我一些安定(Valium)。護士她說如果月經沒來，就得做妊娠檢驗。接著路絲(Ruth)叫我回家休息。梅塔把我載到印地歐的公寓門。在那個上午，我躺在空無一人的屋子裡的帆布床上。整個人處於震驚中還有感覺意識仍游離在身體之外。我記得當時在想：“不敢相信這真的發生了，而我還在這裡...還活著...在我的房間裡... 在上午時分。一切都沒變，但一切再也不一樣了。”

我服下了鎮定劑，一直睡到下午路絲(Ruth)過來為止。

“我們必須得回農場把工會的車開回來。我需要妳帶路，告訴我車在哪。”路絲說。

“我不想回那裡。”我說，“但我可以告訴妳怎麼走。”我試著解釋該如何找到那個營區，但路絲(Ruth)堅持要我陪她一起去，並把其中一輛車開回來。於是，我還是跟著路絲回到農場去取工會的車。那輛雪佛蘭(Chevy)已經被挪過並且停在工人們睡覺的那排長型低

矮工寮旁。路絲下了車走向那輛車。那位前支持者就坐在旁邊，彷彿在那守著車子似的。他躬著身子，凝視著地面。當路絲走近時，他抬起頭來。我沒聽見他們交談了什麼，但我看見了他眼中的痛苦。路絲打開車門，隨即猛地往後一縮，因那股氣味而痛苦地皺起了臉。路絲把那輛雪佛蘭開回家，而我開著她的車。

隔天，我進了辦公室，然後路絲(Ruth)和大衛(David)問我想怎麼做。我說我想繼續從事組織工作.....我不想被這次襲擊擊敗，不想放棄我所熱愛的事情。他們接受了我的決定，但為我安排了一名保鏢。他們要求我與毛里里奧(Maurilio)搭檔，並叮囑我，如果沒有他在場，絕不能單獨去卡里安農場(Carian Ranch)。毛里里奧長得很高，留著黑色長髮和鬍子。他身上散發著一種危險的氣息.....一種難以捉摸的不可預測性。他抽很多大麻，但那似乎對他一點影響也沒有。

我要求從印地歐(Indio)的公寓搬到格雷斯街(Grace Street)的那棟房子，因為我有一些朋友住在那裡，那裡更有社區的氛圍。格雷斯街的房子已經住滿了，但他們允許我在客廳的地板上鋪個睡袋。我養成了一種習慣，每晚睡前都要服用鎮定劑(Valium)並喝啤酒。有時候，我也會在白天的中途回家服用鎮定劑。

當埃利塞奧(Eliseo)回來時，他沒有要求見我，我也沒有試圖去見他。我們從未談論過發生的事。我的月經來了。襲擊發生兩週後，我前往瑪麗斯維爾(Marysville)在 ARLB(農業勞工關係委員會)的聽證會上作證。其實我大可以待在家裡不回科切拉，就這樣從 UFW 銷聲匿跡，那反而容易得多。我做了決定返回，因為放棄工會意味著失去另一部分的自我。我

不想讓強暴摧殘我的整個人生。我熱愛工會、熱愛工人，也熱愛我在科切拉(Coachella)的同僚。我愛這片沙漠的美麗，但更重要的是——我熱愛組織工作，我感到自己被社會正義的事業所召喚。我不能容許我生命的軌跡因為兩個男人的暴力愚行而產生改變。

我搭乘灰狗巴士，穿過聖華金谷地(San Joaquin Valley)返回科切拉。當時是深夜，我望向窗外月光下的葡萄園，那一排排長而筆直的藤蔓在窗外疾馳而過。我自問，回到科切拉究竟是不是正確的抉擇。我閉上眼睛，腦海中浮現了十字架的意象。在那一刻，我感覺自己與歷史上無數遭受暴力折磨的人連結在一起。我不孤單，我也並非異類。耶穌顯得如此親近，平安感隨著月光橫跨葡萄園洗滌了我，進入我的心靈與深處……那是一種安慰，也是一種召喚。我已深深刻入十字架的奧祕之中，而我知道，不知為何、儘管我現在還無法理解，但一切終究會好起來的。

我回到科切拉(Coachella)時，葡萄的修剪季節已接近尾聲。有一天有人告訴我停車場有一位工人找我。我走出去，發現是來自卡里安農場(Carian Ranch)的盧佩·伊尼格斯(Lupe Yñiguez)。他正準備離開科切拉並返回薩利納斯(Salinas)，那裡的高苣採收季才剛要開始。

“莉茲(Liz)，我不能不跟妳說聲話就走。我只是想告訴妳……*te aprecio*……我感激妳”我決定為 UFW 工作並非為了求得他人的感謝，然而盧佩那句由衷的“*te aprecio*”，卻成了我永生難忘的話語。

有一段時間，我的生活看起來似乎恢復了正常。然而，某些看不見的東西已經發生了質變，就像冬雪融化時河水的暗流。事物的意義需要被重新定義。我感受到一種對危險的高度警覺，沒有任何地方顯得絕對安全。

一年一度的椰棗節在印地歐(Indio)的露天會場舉行，一群組織者決定一起去湊湊熱鬧。這個節慶的主題是天方夜譚，現場有音樂、美食、藝術，還有琳瑯滿目的椰棗及相關產品，以及各式各樣的嘉年華遊樂設施。毛里里奧(Maurilio)向一位名叫鮑比·德·拉克魯茲(Bobby de la Cruz)的組織者下戰帖，挑戰他在乘坐某種遊樂設施時，在墜落之際解開安全扣並站起來，好讓過程變得真正刺激。旁人在一邊起鬨，甚至打賭看誰會先退縮。正當他們兩人在那裡逞英雄、裝模作樣時，我悄悄地走開了，獨自走在燈火通明的嘉年華大道上。

節慶現場那種花哨俗艷的後宮風格裝飾，與阿拉伯世界那種端莊謙遜的氣息簡直毫無共同之處。我不禁沉思起科切拉南方幾英里外，那個塵土飛揚、名為“麥加”(Mecca)的小鎮。是誰為它命名的？加州的這個角落，與阿拉伯世界的這份認同感究竟是如何變得如此強烈的？在瑪麗斯維爾(Marysville)確實有耶門籍的農工，但在科切拉谷地，我尚未遇見過任何阿拉伯裔的人。

這番思緒被一名年輕男子打斷了，他是來自卡里安農場(Carian Ranch)的一名農工。我們聊了幾句，我告訴他我是跟朋友一起來的，但他們都在玩遊樂設施。旁邊剛好有一個投幣式拍照亭，他問我能不能跟他一起拍張照。這個請求讓我感到一陣哀傷。那是男女朋友才

會一起做的事。我心中充滿戒備，但我不想一輩子活在恐懼中。於是我們拍了照，將那一捲捲黑白相紙分給彼此，隨後便各自的路。

我的雙胞胎姐姐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春假期間來探望我，但我卻怎麼也沒辦法開口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出於種種原因，我並不想談論強暴這件事。我感到羞恥。那時我抱持著一種誤導性的信念，以為單憑意志力就能讓生活重回正軌。這次襲擊的種種情況，牽扯到了關於種族、性別與社會階級的複雜議題。我不想陷入那種必須向家人捍衛我對工會(UFW)之承諾的處境。我已經跨入了另一個世界，而他們正盡其所能地理解並支持我；但這件事會是他們無法跨越的底線，他們會施壓要我回家。簡單來說，不去談論強暴，至少在短期內，比開口談它要容易得多。

某天早晨我醒來，掙扎著想找回方向感。格雷斯街(Grace Street)的房子裡一片寂靜。我看了看時鐘，意識到職員會議快要遲到了。怎麼可能其他人起床活動的聲音我一點都沒聽到？我迅速穿好衣服，跳上那輛雪佛蘭衝向辦公室。幸運的是，工會辦公室對面的銀行門口剛好有個空位。但我轉進車位時角度太過尖銳，重重地撞上了與路緣齊平的柱子，衝擊力驚人。當時全體 UFW 職員都坐在辦公室前部，就在面向街道的大片落地窗旁。事故發生時，他們全都看得清清楚楚，也聽得真切。我下了車，感到很尷尬。我不僅遲到了，現在還在停車時撞壞了車。我覺得自己像個徹頭徹尾的蠢蛋。我悄悄找了個空位坐下，大家卻表現得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埃利塞奧(Eliseo)繼續對著員工講話，沒有人跟我說一個字。

過了一會兒，一位護士走過來問我需不需要冰敷。

“不，我還好。”我回答。

“妳的嘴唇腫起來了。”她低聲說。顯然撞擊時我的頭撞到了方向盤，隨著會議進行，我的嘴唇也越腫越大。她溜進診所，拿了一個冰袋回來。會議結束時，埃利塞奧離開了房間，隨即辦公室裡響起一陣驚呼。所有的男人都跑到外面去看車，而所有的女人都圍到我身邊，詢問我是否受傷。終於，這裡出現了正常的人類反應。

埃利塞奧怒不可遏。他把我傳喚到辦公室，指控我是故意的，說我沒有盡到妥善管理農工資產的職責。他命令我必須親手修好這輛車。他指派了一名農工協助我，但強調我必須親自完成所有工作：去廢車場找零件、拆下損壞的保險桿並更換它。那名農工是位中年男子，留著灰白的頭髮，為人沈默。他似乎對埃利塞奧的那番咆哮感到很難為情。接下來的幾天，我們一起修好了那輛雪佛蘭。

春天是葡萄疏果的季節。為了對『珍珠(Perlette)』品種進行疏果，工人們會將圓形的橡膠刷套在手上，搓揉那小小的果串，刷掉多餘的果實，好讓剩下的葡萄能長得又大又圓潤。在這個疏果季節裡，查維斯(Cesar)發起了一場橫跨谷地、規模宏大的遊行，從麥加(Mecca)一路走到科切拉(Coachella)。遊行以公園裡的集會和烤肉派對圓滿結束。許多來自卡里安農場(Carian Ranch)的工人都參加了遊行，甚至包括一名監工。菲律賓籍的工人們參與方式格外引人注目，他們幫忙播報廣播，並在遊行隊伍的最前端、查維斯身邊，高舉著菲律賓國旗。

隔天，菲律賓營區的全體工人都被開除了。農場主聲稱他們工作太慢，但因為生產力不足而開除整組工人，甚至連營區的廚師也被開除，這簡直是聞所未聞！工人們認為這是對參加工會遊行的報復，於是我們向 ARLB（農業勞工關係委員會）提交了不公平勞工行為的訴訟。

1977 年的復活節週日，我開車前往印地歐（Indio）的一座天主教堂並停好車。彌撒已經開始，教堂的大門緊閉。我停留在陽光普照的階梯上，將手平放在溫熱的木門上。隨後，我緩緩轉身走回車裡。我的心中沒有復活，只有十字架。

兩週後，又有更多工人從墨西哥營區被遣散。他們大多數一直積極參與工會，但並非全部。其中一名工人向領班投訴，說原本承諾他可以穩定工作到採收季結束。領班嘲笑著建議他去跟莉茲·蘇利文（Liz Sullivan）要工作。正如盧佩·伊尼格斯（Lupe Yñiguez）所預言的，領班的親戚們開始湧入營區。那景象彷彿傑利斯科（Jalisco）高地的一整座村莊都被清空搬來了。領班的母親也在這群新工人之中，那是一位擁有鋼鐵般眼神的優雅長者。她的名字叫索拉（Zoila）。

我們為那些從墨西哥營區被開除的工人提交了不公平勞工行為的訴訟，而我則開始著手去認識那些新來的人。大多數家庭裡總會有幾個自由靈魂，我下定決心要從領班的族群中找出那些擁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當我開始梳理那複雜的人際關係網時，我畫了一張家族

樹狀圖，將索拉(Zoila)的名字放在頂端；每當有人簽下授權卡時，我就在他們的名字旁打個勾。

內部的背叛

隨著採收高峰期臨近，查維斯(Cesar)派出了馬歇爾·甘茨(Marshall Ganz)與吉姆·德雷克(Jim Drake)來協助埃利塞奧(Eliseo)，為科切拉谷地的選舉做最後衝刺。來自埃爾琴特羅(El Centro)與卡萊克西科(Calexico)的組織者們隨同馬歇爾來到科切拉，我們的隊伍一夜之間增加了一倍。好幾個月來，梅塔(Meta)和我一直是科切拉僅有的女性組織者。現在，這裡多了好幾位女同僚，但我看著她們做著一些我知道非常危險的事，比如獨自前往營區。我開始個別找她們談話，提醒她們要小心。其中一位新來的組織者菲莉絲(Phyllis)察覺到了我的擔憂。

“妳談了很多關於安全的事。或許我們該開個女性會議，討論一下保持安全的策略。”

她的建議讓我感到驚訝，但我同意了。菲莉絲開始籌劃一場女性安全會議。最後只有幾個人參加，且大多數是負責後勤支援而非第一線組織工作的女性。其中幾位女性想聊聊安全以外的議題，例如女性在 UFW 內部的整體地位。我試圖將焦點留在安全上，並分享了我對於如何避開危險處境的想法。

然而，參加會議的其中一位女性向埃利塞奧(Eliseo)通報，說我們試圖在內部搞小組織。在當時，這是一個極其嚴重的指控，因為那時 UFW 正在清洗被懷疑是共產黨員的人士。兩天後，吉姆·德雷克(Jim Drake)單獨找我談話，問我為什麼參加那個會議。

“我很擔心最近來到科切拉的女性安危，”我解釋道，“我看著她們做一些危險的事，像是獨自前往營區。”

“如果你擔心女性的安全，難道不應該把這些顧慮反映給埃利塞奧，然後在全體職員會議上解決，而不是私下開自己的小會嗎？”他反問道。

當然，這聽起來是多麼完美且合乎邏輯！那是任何合理的人都會做的事，但對我而言，那卻感覺完全不可能。我不怎麼認識吉姆·德雷克，所以我沒有告訴他我曾被強暴過，也沒有告訴他襲擊發生時我早已向直屬主管彙報過，而他們甚至曾指派了一名保鏢陪同我前往營區。我沒有告訴他，科切拉的管理團隊其實非常清楚女性所面臨的危險，卻沒能對來自埃爾琴特羅與卡萊克西科的新進組織者提供警告或保護。這些事我通通沒說。相反地，我只是簡單地陳述，我認為女性自行召開會議來分享安全心得並無任何不妥。

幾天後，我們所有人被召集參加一場特別的早晨職員會議。由於原本的店面空間已經容納不下我們，我們改在轉角處的一個倉庫集合。當所有人到齊後，埃利塞奧宣佈，有些女性被指控在內部搞小組織，她們必須向全體人員做出交代。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扭曲版的希納農遊戲，這本是一種用來瓦解那些慣於撒謊之成癮者的藥物治療技術。參加過安全會議的每一位女性，被一個接一個地推上“熱座”，房間裡的任何人都可以在席間對她隨意發表演

論。那些話不需要是事實，而且沒有人可以為她辯護。每一位女性都必須獨自面對拋向她的任何指控或羞辱，並為自己辯護。

我驚恐地看著這場鬧劇上演。那些我想要保護的女性，正遭受著惡毒的言語與情緒攻擊。是我對安全的擔憂促成了這場遊戲，而現在我卻無力阻止……我所能做的只有看著。這感覺像是第二次強暴，一種與那場暴行同樣深深刻進我靈魂的背叛。直到那一刻為止，儘管經歷過性侵，我依然抱持著希望。我曾因為知道自己是這場追求社會正義的非暴力鬥爭的一員，而感到慰藉。我曾深信組織工作可以改造社會，為這個世界帶來更多的慈悲與正義。然而現在，聯合農工工會 (UFW) 在我眼前崩解，變成了一個我完全無法認同的模樣。

輪到我被“遊戲”之前，一位名叫艾倫 (Ellen) 的年輕女律師走進房間找我。她需要我為農業勞工關係委員會 (ALRB) 的一場不公平勞工行為聽證會作證。起初，埃利塞奧 (Eliseo) 不肯放人。他說我必須待到輪到我坐上“熱座”為止。但那位律師非常強悍。她說她現在就需要我，無論他喜不喜歡，她都要帶我離開那個房間。她走過來，牽起我的手。我跟著她走了。

當我抵達 ALRB 辦公室時，州政府的律師們正等著為我的證詞做準備。然而，我卻止不住地嚎啕大哭，完全無法冷靜下來。律師們離開又回來了好幾次，卻發現我依然在抽泣。我試圖用意志力讓自己平復，但淚水卻像決堤的情感洪流般不斷湧出。最終，律師們取消了我的證詞。與此同時，希納農遊戲仍在繼續，顯然埃利塞奧試圖在我缺席的情況下將我推上“熱座”。露絲 (Ruth) 阻止了他。這位來自密蘇里州的前修女平日輕聲細語，卻極其固執。她宣稱，既然我不在場，任何人都不得對我評頭論足，她絕不允許！我將永遠感念露絲為

我挺身而出，而她的道德權威在那一刻也得到了認可。遺憾的是，菲莉絲(Phyllis)最終因籌劃女性安全會議而被歸咎並遭到開除。

葡萄採收權的選舉在 1977 年 6 月下旬舉行。查維斯(Cesar)發起了一場“萬福瑪利亞”(Hail Mary, 指最後一搏)式的衝刺，親自前往各個農場，向那些簽署了授權卡的工人們致謝。在查維斯出發前往卡里安農場(Carian Ranch)之前，我和他一起坐在車裡。

“所以，瑪麗斯維爾和尤巴城(Yuba City)最近怎麼樣？”他問道。這個問題顯出一種不切實際的虛幻感，就像我們坐在在六月科切拉谷地正午的酷暑中，在我們正為了爭取葡萄工人的代表權而陷入激戰之時，我的家鄉感覺如此遙遠，彷彿屬於另一個前世。

“我不知道，”我回答，“我一直待在科切拉工作。”

當我們抵達農場時，組織者們走下田間小徑，確認支持查維斯的工人們的位置，好讓查維斯能親自向他們致謝。在其中一排的正中央，我遇見了那位前支持者。我向他說明我在做什麼，但他搖了搖頭。

“查維斯是不會走進這一排的。”他說。我繼續往前走，來到聯外道路上，查維斯正等在那裡，身邊圍繞著他的保鏢。我向他描述了那一排裡有哪些人，包括那位老人。

“那一排我不去。”查維斯說，隨後他便走向下一位組織者。

卡里安農場(Carian Ranch)的選舉結束後，我又在工會(UFW)留了幾個星期。由於雙方都對大量選票提出異議，投票結果遲遲無法確定。農場主的兒子在最後幾天簡直陷入了瘋狂。他和小弗雷德·羅斯(Fred Ross Jr.)第一次打了起來，還開著拖拉機把大衛·馬丁內斯(David Martinez)的車推到了馬路對面。他甚至辱罵一位來自卡萊克西科(Calexico)的女組織者是妓女，並散發傳單，傳單上將 UFW 的女組織者描繪成以性交易換取選票的形象。儘管存在這些不當行為，ARLB(農業勞工關係委員會)最終仍命令農場主必須與 UFW 進行談判，無視那場有爭議的選舉結果；然而，這項命令卻被對方完全無視了。

離開工會

葡萄採收季結束了。聯合農工工會(UFW)輸掉了科切拉谷地葡萄園的大多數選舉，組織團隊也隨之散去。1977 年 7 月中旬，我決定離開工會。我與埃利塞奧(Eliseo)見面，遞交我的辭呈。令人感到怪異的是，埃利塞奧從未跟我談過那場強暴，卻在我把雪佛蘭撞向銀行柱子時勃然大怒。他在希納農遊戲中的冷酷無情，對我來說更是不可理喻。我無法就這樣離開工會，我必須至少與他進行一次關於強暴的直接對話。我鋼鐵化了自己的心志，努力衝破那份羞恥感與恐懼。

當我告訴埃利塞奧我想要辭職時，他顯得並不愉快。這讓他的組織團隊出現了空缺，而他們當時正專注於從各個農場選出代表，準備參加八月的 UFW 大會。當我遞給埃利塞奧辭職信時，他拒絕接過去。

“別給我。給查維斯吧，是他唯一雇用妳的。”

“好。”我回答，心裡有些困惑。他顯然不希望我離開，卻又帶著一種冰冷的蔑視與我保持距離。

“埃利塞奧，妳知道我二月載兩名工人從會議回家時被強暴了嗎？”我問道。

“嗯，農工並非完美。”他回答，那語氣彷彿我是在對他所屬的整個階級進行控訴。在那一刻，我意識到在埃利塞奧眼中，我有多麼被視為外人。我們之間橫跨著一道深淵，而我既沒有語言、沒有工具，也沒有意願去跨越它。

我從埃利塞奧(Eliseo)的辦公桌上拿回辭職信，裝進信封，寄往拉巴斯(La Paz)。我搭上灰狗巴士，去洛杉磯探望我的教父。查克叔叔(Uncle Chuck)請我到一家裝潢優雅、有著仿土坯牆的墨西哥餐廳吃午餐。菜單封面印著一張原住民女性的照片，她披著色彩斑斕的長披肩，頭上平穩地頂著一個籃子。午飯後，叔叔和堂兄邀請我去游泳，但我沒有泳衣。他們帶我去了購物中心，我注意到商店裡所有的女性都留著同樣蓬鬆、有層次的髮型。當我還在田間進行家庭訪問、收集授權卡時，法拉·佛西(Farrah Fawcett)已經攀上了流行文化的巔峰。我彷彿是從一個遙遠的異國長期居留後歸來，然而，在我與那個被埃利塞奧歸類的社會之間，卻橫跨著一道深淵。那天晚些時候，我和叔叔去散步，他看得出來我有些不對勁。

“妳走路的時候為什麼總看著地面？”他問道，“告訴我，什麼事在困擾著妳？”

我徒勞地搜尋著詞彙來描述我的感受。自從六個月前聖誕節拜訪以來，一切都已經天旋地轉。我正試圖找一個堅實的立足點，一個能讓我站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之間的位置，但大地卻不斷在我的腳下崩塌。我回到了瑪麗斯維爾(Marysville)和試圖規劃人生

的下一步。我並不想返回學校，反而更想去工作。我當時有個模糊的念頭想搬到舊金山。為了賺一點錢，我跟一些農工朋友在番茄收穫機上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在那個地方，我遇見了我未來的丈夫，赫克特(Hector)。

後記：彼此承擔責任

最終，當我步入中年，在經歷了大量的心理諮商、靈性修煉、一段失敗的婚姻，以及查維斯(Cesar)去世後，我試圖要求聯合農工工會(UFW)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負責，特別是當年發生在科切拉那場扭曲版的希納農遊戲，那場將參加安全會議的女性推上『熱座』並進行言語攻擊的殘酷行徑。

在1996年1月，我致信給大衛·馬丁內斯(David Martinez)，他隨即回了電話。他承認當時的情況非常糟糕，並對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深表歉意。他表現得非常支持。我提出了一些建議，關於UFW在查維斯去世後該如何開闢新路徑、轉變其組織文化。大衛喜歡我的想法，但他覺得自己幾乎沒有權力去推動這樣的變革。他說他需要時間，至少六個月。

湊巧的是，1996年9月，我在奧克蘭教區的一個牧靈會議上見到了朵洛瑞絲·韋爾塔(Dolores Huerta)，她是當時的演講嘉賓。我告訴她關於我與大衛的對話，並問她是否看過我的信。她告訴我大衛已在1996年4月離開了工會，並要求我將信件寄給她，信封上需註明“機密”。我照辦了，隨後等待了十個月。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決定寫信給查維斯的女婿、同時也是UFW的新任主席阿特·羅德里奎茲(Art Rodriguez)。我告訴他關於我給大衛的信、與朵洛瑞絲的會面，以及這期間完全沒有得到任何回應的事實。我威脅要公開這一

切，並開始談論當年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要求 UFW 針對當年在科切拉為了報復女性安全會議而舉行的『希納農遊戲』，給予正式道歉。

阿特(Art)沒有直接回覆我，但他派了多洛雷斯·韋爾塔來與我面談。1997 年 9 月，她來到我位於奧克蘭的家中。那次會談進展得非常不順。多洛雷斯一開口就告訴我，UFW 沒有理由向我道歉。她竟然說：“強暴不過是男人對女人會做的事罷了”，並聲稱我遭遇的強暴與工會毫無關係。我告訴她，強暴是權力的犯罪，而非慾望的產物；如果她認為在卡里安農場組織運動期間、在葡萄園中央發生的強暴案與工會無關，那她就錯了。我將那次襲擊視為一種試圖讓我噤聲、讓我失去組織能力的手段。

但沒問題，即便我們退一步說，強暴與科切拉的工會組織運動前後關係完全無關——僅僅是男人對女人會做的事——那麼希納農遊戲則是另一回事，那是工會必須負起全責的行為。

然而，多洛雷斯再次駁回了我的訴求。她說希納農遊戲只是種無害的團隊建設練習，是那種企業會帶員工做的活動。她甚至否認科切拉曾發生過希納農遊戲，並說我描述的那場會議極其荒謬，且與查維斯和董事會關於希納農遊戲所做的任何決定都無關。我提醒她，當時有兩位 UFW 董事會成員參與了那場會議：埃利塞奧·馬地那(Eliseo Medina)與馬歇爾·甘茨(Marshall Ganz)。

接著，她強硬地質問我，為什麼這一切發生時，我沒有主動聯繫她？為什麼我沒有告訴她？還沒等我回答，她就替我說了答案：“妳大概是以為我沒有任何權力，妳以為我什麼都做不了。”她看起來一臉受挫的神情。突然之間，這場對話的主角變成了她自己。

顯而易見，這次會面根本毫無進展，我也準備好請她離開我家了。然而，在最後一個令人屏息的驚人舉動中，朵洛瑞絲宣稱：“我知道這全都是大衛·馬丁內斯的錯。他才是幕後黑手！”“我高度懷疑這一點，”我回答，“當時負責科切拉辦公室的人是埃利塞奧。”

既然 UFW 的工作人員連換個輪胎都得經過查維斯的許可，那麼在我看來，無論那場會議是否被定義為希納農遊戲，查維斯(Cesar)本人極大可能就是下令開會的人。多洛雷斯(Dolores)答應會去調查是誰負責召集科切拉的那場會議，並回覆我調查結果。但我再也沒有收到她的任何音訊。

我最終聯繫了埃利塞奧·馬地那與馬歇爾·甘茨。埃利塞奧沒有回應。馬歇爾與我談了話，他非常和善；他承認了當時的情況有多麼惡劣，並向我道歉。

當我步入中年，開始與家人坦誠地談論強暴這件事時，我的妹妹費羅倫絲透露了一個令我不安的秘密。1976 年 11 月，就在大選前夕，她陪我一起去薩克拉門托，為 UFW 的第 14 號提案進行催票工作。我們與數十人一起睡在體育館的地板上。我離開了費羅倫絲一小段時間，大約 20 分鐘。就在那段時間裡，一名男子對她進行了猥褻。那時費羅倫絲才小學八年級。我本該是負責我妹妹安全的成年人，但我卻徹底辜負了她。這是我將永遠感到後悔的一件事。

